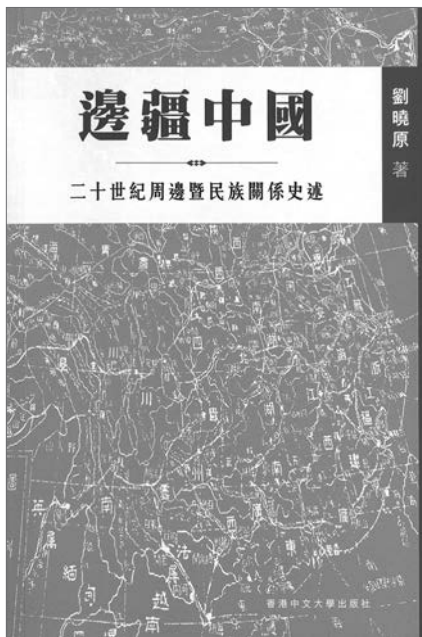


# 從化人到劃界

## ——評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 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毛昇



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  
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 一 前言

「今天的中國從何而來？」「甚麼是中國？」「誰是中國人？」這些問題是近年來中外學界的關注點。

這一熱度的產生，既有現實政治的因素，亦有內在的學術理路可尋。從現實政治層面而言，今天國人正面對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一方面是所謂「中國崛起」，經濟騰飛，外交活躍，一幅盛世景象；另一方面，邊疆的分離趨勢卻在加強，邊疆人口的「中國人」認同正在弱化甚至瓦解，如何解釋其中的原因？

從學術理路來看，關於邊疆問題，以往中文學界常常局限於「大一統」觀念、漢族中心視角、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上言論空間的逼仄，大部分所謂邊疆民族研究只是對國家民族政策的註解，往往以「自古以來」立論，藉之正當化國家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戰略，還很難說是獨立的學術研究。而西方有些相關研究常將複雜的中國民族邊疆問題簡化為西方讀者所關心並能理解的人權問題，雖為弱勢發聲，其偏頗之處亦顯而易見。

難能可貴的是，近年來在中、港、台三地出現了幾部中文專著，極大推動了邊疆研究的發展。如王

以往中文學界大部分所謂邊疆民族研究只是對國家民族政策的註解，往往以「自古以來」立論，藉之正當化國家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戰略。而西方有些相關研究常將複雜的中國民族邊疆問題簡化為人權問題。

近年出版的一些關於明清以來國家與邊疆關係的英文專著將邊疆放在中心的位置，強調邊疆對於中國形塑的重要性。邊疆及其民族在中國現代領土的確立和中國認同的形成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明珂通過研究中國人的「族群邊緣」來解答「甚麼是中國人」的問題。他認為族群意識實由族群邊界來維持，彷彿在紙上畫一個圓形，正是「邊緣」那條線讓一個圓形看起來像個圓形<sup>①</sup>。葛兆光在「何為中國」的問題上試圖與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為代表的民族主義的建構論範式對話，指出一個在政治和文化上始終有延續性的中國早在宋代已經建立，並非印刷資本主義出現後才形成的想像<sup>②</sup>。王柯則試圖梳理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在各個時代發展演變的脈絡，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形成與演變中的日本因素<sup>③</sup>。以上的研究在視角上明顯受到了西方理論的影響，但在文獻資料上下的功夫極其深厚，並試圖以中國的經驗研究與國際學界對話。

新世紀以來西方學界的清史研究試圖從邊緣來看中心，成果顯著。以哈佛大學歐立德(Mark C. Elliott)為代表的「新清史」研究群關注少數族裔的權利，即所謂從「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來看清代的歷史。他們批評何炳棣等學者關於清朝之所以在疆域擴張、人口增加、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是因為「漢化」比較成功的觀點。「新清史」學派以「滿族中心」取代「漢族中心」，認為清朝所取得的成就不僅不是因為成功「漢化」所致，反而是因其滿人特性所得<sup>④</sup>。

近年出版的一些關於明清以來國家與邊疆關係的英文專著也將邊

疆放在中心的位置，強調邊疆對於中國形塑的重要性，有的學者強調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固然是西方列強侵略所致，更是漢政權與邊疆民族政權交涉的結果。邊疆及其民族在中國現代領土的確立和中國認同的形成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sup>⑤</sup>。一些研究指出，中國遲至十八世紀的清代才開始對邊疆實行統治，且國家對邊疆的控制也是時有時無。邊疆進入中國的版圖，亦非因為邊疆人口嚮往「先進」的儒家文化，只是不幸被軍事征服。近代以來的漢族人口移民邊疆，並未讓「落後」的少數民族得以進步，因為移民人口的組成主體為發配邊疆的罪犯、戍邊的武夫以及飢餓的逃荒者，並非精英文化(high culture)的攜帶者<sup>⑥</sup>。在現代新疆史研究方面，有的學者突出了新疆的「穆斯林」特質，認為伊斯蘭教的信仰者才是新疆的主人，卻不幸被大批移入的漢族人口所邊緣化<sup>⑦</sup>。通過從少數族裔的角度來書寫中國史，學者希望這些長期被漢族或中心區域所遮蔽的聲音能逐漸被聽到。

受法國「年鉴學派」(the Annales School)的影響，近二十年來西方史學家試圖跳出國族史的局限，研究處於國與國之間模糊地帶的邊疆、邊境及其人口。在他們看來，邊疆、邊境並不總是阻礙了國境線兩邊人與物的互動，在某些情況下，正是因為有了區隔，才使得雙方的互動更加活躍。這一新的研究趨勢因其不局限於某個民族國家的框架，淡化了國家之界，聚焦於身份認同的形成或改變，以及人與物的跨國流動，被稱為跨國境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sup>⑧</sup>。

冷戰結束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開始取代蘇聯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個「假想敵」。為了探究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政治學學者將目光投向1949年以來中國如何處理與鄰國的領土糾紛問題。他們發現，與西方世界固有的「強硬」的共產中國這一刻板印象不同，毛澤東時代在解決領土糾紛問題上就表現出了明顯的現實主義。在有爭議的領土問題上，並非「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地一寸都不能丟」，相反，為了政權的穩定或外交戰略的需要，領導人常常選擇妥協。中國政府在處理領土爭端上所表現出的現實一面，似可證明「中國威脅論」只是西方因為對中國缺乏了解而產生的不必要的擔心<sup>⑨</sup>。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教授劉曉原多年來致力於中國邊疆史的研究，已出版多部英文專著，是該領域的重要學者<sup>⑩</sup>。其研究取徑顯然受到了近年西方邊疆研究的影響，但他並非只是該潮流的追隨者，其研究有鮮明的獨特之處。早在撰寫第一本著作《事預則廢：中國、美國及其處理戰後日本帝國的政策》(*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的過程中<sup>⑪</sup>，他便意識到從事中美關係史的研究，如果不了解中美關於中國邊疆的政策，則無法深刻體認二十世紀中美之間的外交折衝。更重要的是，在文革期間，他作為知識青年曾在內蒙古插隊，多年的邊地生活不僅使他這個北京青年開始了解

邊疆，更產生了一種邊疆情結。可見，致力於邊疆研究對他而言，不只是求知，更是學術意義所在、人文關懷所繫。

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以下簡稱《邊疆中國》，引用只註頁碼)是劉曉原的第一本中文著作，討論內容主要為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外交史，但能貫通古今，把近現代問題放在長時段下考察，溯其源流，視野可謂寬闊。作為一位在美國接受學術訓練並長期任教的學者，作者對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不僅熟悉，且能揚長避短。更重要的是，該書不僅指出了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還為我們呈現了複雜性之所在，從而提供了一個理解民族邊疆問題的新角度。與中國學者往往專注於史實的重建不同，作者將「史」與「論」很好地結合起來，全書既清通可讀，亦有理論深度。

## 二 本書內容

《邊疆中國》由〈引言〉與十個章節構成。作者在〈引言〉中指出本書研究的主題要旨，即「中國近現代疆域和民族構成形成的歷史過程」，其聚焦的主要內容則為「政黨鬥爭」、「民族關係」、「外交折衝」以及「社會變動」(頁xiii)。同時，也指出了中國近現代疆域形成的關鍵所在：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被迫經歷了一個劃時代的「領土屬性」轉型，從「中國古代宗藩朝貢體系下的疆域觀念和歸屬關係，嬗變為源

劉曉原多年來致力於中國邊疆史的研究，其研究取徑受到了近年西方邊疆研究的影響。《邊疆中國》不僅指出了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還呈現了複雜性之所在，提供了一個理解民族邊疆問題的新角度。

《邊疆中國》指出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被迫經歷了一個劃時代的「領土屬性」轉型，藉此從理論上概括了近代以來「天下」制度瓦解後，中國在國家結構和功能方面的變化。「領土屬性」的轉型可謂本書的「眼」，各章節都圍繞該概念展開。

自西方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近現代主權觀念下的領土歸屬關係」(頁 xv)。

歷史學者梅爾(Charles S. Maier)提出「領土屬性」(territoriality)的轉型雖不是從二十世紀開始，然而亦為該世紀一個顯著特徵。按照他的說法，「領土屬性」指的是在一個民族所佔據的地域內，國家精英利用蒸汽、鐵路、郵政、電報、電力等現代技術及建立現代官僚系統等手段將該地域同質化，並連成一體。對外，通過確立邊界，與「他者」相區別；對內，動員生活在該地域的人口，將對該地域的認同變成每個人的一種重要的身份認同。於是，在現代社會，一種對某個有明確邊界的地域的忠誠取代了前現代那種以身份的等級化為基礎的認同。同時，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人口管理、資源利用等各個方面的運作都奠基在該認同之上<sup>⑩</sup>。在本書第一章中，劉曉原引入了這個概念，藉此從理論上概括了近代以來「天下」制度瓦解後，中國在國家結構和功能方面的變化。「領土屬性」的轉型可謂本書的「眼」，其他各章節都圍繞該概念展開。

第二章討論1911年前後出現的所謂「保皇」、「立憲」、「革命」等各種政治力量關於「何為中國」、「何為中國人」的爭論，而核心的問題即如何維繫中央與邊疆、漢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作者意在說明中華民國對滿清王朝在疆域上的繼承並非自然而然，辛亥前後曾有過中國應該是一個排他性的漢族中國，讓蒙、回、藏「任其去來」，還是一個應該納五族入中華的包容性的中

國的搖擺。對清代疆域的繼承只是漢族從滿族手裏奪取政權並成為主導族群後，為追求疆域最大化的一個選擇。「五族共和」也只是為了將清代的疆域統合在民國內的策略，並非蒙、回、藏的意願。於是，以蒙古、西藏的分離為開端，民國進入了一種大分裂的狀態。

第三章談論了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三個要素：「時間」、「形體」與「顏色」。所謂「時間」，即中美交往中，美國以現代化的實力將中國視為「落後」國家，而蔣介石和之後的中共領導人雖因經濟、軍事實力不濟而承認中國的所謂「年輕」，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卻又使他們認為中國在道德和文化上遠比美國「古老」，並不甘心以美國為「大哥」。這種無奈與不服氣導致的「受害者心理」實為中美關係磕磕碰碰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意思的是，中國領導人儘管不甘心唯美國馬首是瞻，但歷屆政府又積極師法歐美國家，努力縮短中國與歐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時間差，希望早一天能與列強平起平坐<sup>⑪</sup>。「形體」則是指在歐美主導的國際規則下，一個國家只有先成為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獲得《國際法》所承認的有明確邊界和獨立主權的疆域，才可被接納進入國際社會。在這一遊戲規則下，朝貢體制下模糊、移動、靈活的邊界被定義為「落後」，因而成為中國以「文明國」身份被國際社會接納的障礙。「顏色」指代意識形態，如紅色指共產主義。本章談到意識形態的不同如何成為冷戰時代中美關係的障礙。在邊疆問題上，本章揭示的是現代



中國雖已改造為民族國家，但「天下」觀念作為傳統文化以及「過去的輝煌」賦予國人「老子曾經鬧過」的自信，仍在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國人的心態。

為甚麼冷戰在歐洲表現為「冷」戰，而在亞洲卻導致持續的「熱」戰？第四章以二戰時期中美兩國針對戰後朝鮮問題的外交交涉為例，意圖跳出冷戰政治史的框架，強調亞洲的熱戰不只是意識形態或制度之爭，更是民族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之必然結果。在作者看來，當西方世界已經進入社會制度之爭並以意識形態的對立形成兩大政治集團時，亞洲國家還沒有解決民族獨立、國家統一這些歐洲國家早已解決的問題。因此，亞洲國家內部的戰爭不只是關於走甚麼道路的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實現民族國家建構的問題。而美國和蘇聯對亞洲國家內部熱戰的回應，更加劇了這些國家戰爭的熱度。

第五、六兩章以蒙古問題為例，討論戰時和戰後初期美國政府針對中國邊疆的戰略思考和政策行為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版圖。根據作者的考察，美國針對中國邊疆地區的政策對「海棠葉」形中國版圖的瓦解和「公雞」形版圖的維持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國戰時外交對蘇聯關於外蒙獨立的立場的支持，並施壓於國民政府，是直接導致外蒙脫離中國的重要原因。在支持外蒙獨立的同時，美國堅持中國對內蒙古的主權，對自治運動態度冷漠，使得內蒙古的分離運動始終處於不利的國際環境之中。美國政府的「內蒙外交」是內蒙古不脫離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蘇關係對中國疆域的「形體」影響更大。在中國學者關於近代史的主流敘述中，沙俄/蘇聯侵吞大片中國領土並煽動、支持民族分裂，是中國失去外蒙的罪魁禍首。第七章討論1950年代中國和蘇聯因為相同的意識形態結成「同盟」、「一邊倒」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外蒙問題如何成為中蘇關係中的一個「暗影」，甚至是「定時炸彈」，隨時可以導致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出於現實考慮，1949年後中共在要求外蒙回到中國的要求不被蘇聯支持後，以忍氣吞聲來換取蘇聯援助，這是「北京以一個弱勢夥伴的身份同莫斯科結盟所付出的代價」（頁203）。與此同時，外蒙問題是中蘇關係中的「第一道裂隙」（頁205），也為幾年之後的中蘇分裂埋下了伏筆。作者試圖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結盟雖然以國際主義相號召，但背後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民族國家利益。

第八、九兩章討論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共如何處理西藏問題，目的似乎更在於檢討西方學界在西藏問題研究中的「冷戰視角」，即僅從意識形態或冷戰策略的角度來分析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的作為。作者認為，要理解中共在冷戰時期對西藏問題的處理，不能只是在冷戰中找原因，而是要放到更長的時段去考察，庶幾能有深入的體認。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近代民族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對西藏問題產生重要影響，三者缺一不可。對研究者來說，難點在於判斷「哪個因素在何種場合起了主導作用」（頁270）。

一個國家只有先成為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獲得《國際法》所承認的有明確邊界和獨立主權的疆域，才可被接納進入國際社會。朝貢體制下模糊、移動、靈活的邊界被定義為「落後」，因而成為中國以「文明國」身份被國際社會接納的障礙。

如果說，〈引言〉是本書的「鳳頭」，高屋建瓴，前九章是「豬肚」，內容充實，那麼第十章無疑可稱為「豹尾」。作者在該章提出了研究中國邊疆史的新視角：即「不以『中國』限定『邊疆史』，而以『邊疆』定義『中國史』」（頁281），也就是所謂的從邊緣來看中心。進而，作者提出中國在經過了近現代兩個世紀的嬗變之後，仍然是一種「『邊疆國家』狀態」，離一個「整合國家」仍然遙遠（頁298）。

### 三 破解迷思

《邊疆中國》一書破解了邊疆史敘述中以「自古以來」立論的迷思，將中國版圖的盈縮放回當時的歷史場景中去考察，從而「歷史地」看待中國近現代疆域的形成。長期以來，類似「自古以來」的說法不僅頻繁出現於各種外交辭令，即使是嚴肅的學術著作，該表述亦觸目皆是。如研究近代邊疆史的權威著作、呂一燃主編的《中國近代邊界史》一書，在第二章「中國與俄國的邊界」中，開頭第一段即為「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早在俄羅斯國家還沒有出現以前，黑龍江流域、烏蘇里江以東濱海地區以及庫頁島，已經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世代居住在自己的這片土地上，勤勞地從事各種生產勞動」<sup>④</sup>。這種先用「自古以來」為理據將某些土地預設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再來譴責列強如何「侵略中國邊疆」的書寫手法，

被作者謔為「失地學派」（頁282）。該「學派」往往將中外邊界史簡化成列強侵略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政府組織學者書寫各種版本的《沙俄侵華史》<sup>⑤</sup>。

「自古以來」說法存在的問題，正如本書〈引言〉部分所指出的，「對涉及領土、民族的問題，動輒以『自古以來』立論，似乎近代以來中國所經歷的大變局從未發生過」（頁xiii）。今天國際社會所指的「領土」，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有清晰邊界和獨立主權的國家疆域。此概念並非從來就有，而是十七世紀歐洲經過三十年宗教戰爭後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的結果。而中國獲得西方意義上的「領土」，更要到鴉片戰爭戰敗、中國被迫接受西方舶來的《國際法》之後。換而言之，中國今天所擁有的「領土」並非來自老祖宗，而是近現代中西外交折衝的產物，「自古以來」的說法顯然違背了這一史實。

「自古以來」說法的缺失還在於分不清宗藩關係與民族國家制度之間的區別。無論對中國傳統的宗藩朝貢體系如何評價，在該體系下並無所謂現代意義上的「領土」。根據劉曉原的概括，宗藩朝貢體系的特徵如下：一、「上國」與「下國」關係不對稱，上國以大字小，下國以小事大；二、由內向外，離中心愈遠，關係愈疏，形成費孝通所謂的「差序格局」；三、王朝主權邊緣模糊、多變，並無清晰的邊界，而疆域的大小主要取決於中原與藩屬實力的對比。當中原足夠強勢，可能會佔領藩屬的土地，將疆域極大

作者提出了研究中國邊疆史的新視角：從邊緣來看中心。中國在經過了近現代兩個世紀的嬗變之後，仍然是一種「『邊疆國家』狀態」，離一個「整合國家」仍然遙遠。

外擴，如清代康乾盛世時的版圖，達到明代的兩倍。相反，一旦中原勢弱，藩屬不僅可以吞噬中原的土地，還可以登堂入室，成為中國的統治者，如元代和清代都不是漢族政權（頁xvi）。

與民族國家強調領土歸屬不同，傳統中國更強調外族的向化。吳文藻曾指出：「東南諸省，以海為界，本是國界，而並不被視為邊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稱為邊疆。這明明不是指國界上的邊疆，而是指文化上的邊疆。」<sup>⑩</sup>換而言之，文化落後的地方，即使處於內陸，亦為邊疆。由此可見，在朝貢體系下，「邊疆」的含義主要是關乎外族的歸化程度。在西力東漸之後，邊疆問題變成涉及國家主權的地之歸屬問題。相應地，邊疆的界限從模糊變得清晰，邊疆的重要性從「萬里無用之地」變成要「寸土必爭」的國土，邊境的控制亦從有邊無防甚至無邊無防轉至嚴密布防。正如《邊疆中國》一書所示，近代以來中國開始確立領土邊界，將藩界變成近代國際邊界；與原來的藩屬國，從區分尊卑、遠近到區分內外，即從夷夏之防變成中外之防；同時，中央對境內領土，尤其是邊疆地區加強控制，改因俗而治的放任制度為改土歸流、移民實邊、駐軍建省，實現了「國內主權的擴展」。在國際上，中國亦逐漸獲得了《國際法》保護的主權，尤其是在二戰中中國得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並與美、蘇、英等並列「四強」，獲得了完整的國際主權（頁8-10）。

當習慣以「自古以來」說事兒的「失地學派」為近代以來中國在

被迫劃界的過程中失去的大片「國土」而大表憤慨時，劉曉原指出了其中的「失」與「得」：「在這條疆界之外，中國喪失的主要是封建相對主權。在這條疆界之內，中國獲得的則是近代絕對主權。」（頁9）

## 四 轉型的悖論

從「化人」到「劃界」的轉型無疑是被迫的，猶如鳳凰涅槃，但這並非故事的全部。《邊疆中國》的高明之處，就是呈現了這個過程的複雜性，並表現在幾個悖論上。

悖論一：以民族國家替代「天下」制度，剛開始中國心不甘情不願，而一旦上了這個軌轍，如何形塑中國成為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成了歷屆政府的主動追求。1863年，當傳教士丁韞良(W. A. P. Martin)翻譯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部分譯文送到總理衙門，朝臣認為翻譯「字句拉雜」，評價負面，奕訢對皇上說丁韞良誇耀外國亦有政令，是要仿效利瑪竇(Matteo Ricci)在中國揚名。到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海域捕獲了一艘丹麥漁船，中國官員病急亂投醫，引用了《萬國公法》，居然不費一彈就讓普魯士歸還了商船。從此他們開始意識到《國際法》是保護中國利權的重要依據。這一點在清廷處理與藩屬的國界上尤其重要，只有與鄰國劃界，獲得了《國際法》的保護，才可保證領土不為列強所覬覦。以近代中俄關係為例，自簽訂《北京條約》後，中俄劃界開始啟動。如在中亞，清廷被迫接受以中國的常設卡倫為邊境線，

用「自古以來」為理據將某些土地預設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再來譴責列強如何「侵略中國邊疆」的書寫手法，被作者譏為「失地學派」。中國今天所擁有的「領土」是近現代中西外交折衝的產物，「自古以來」的說法顯然違背了這一事實。

從「化人」到「劃界」的轉型無疑是被迫的。以民族國家替代「天下」制度，剛開始中國心不甘情不願，而一旦上了這個軌轍，如何形塑中國成為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成了歷屆政府的主動追求。

得到的領土自然遠遜於以移設卡倫或添設卡倫為界所能獲得的領土面積。儘管這一中俄交涉已成為帝俄侵吞中國領土的證據，但如果沒有劃界，在列強環伺下，新疆是否還能保留在中國的領土內將是一個疑問。

《邊疆中國》一書對這一悖論的闡釋首先在於考察中西關於「時間差」的論述，強調中國在該論述下如何主動積極與西方「對表」。近代的西方列強恃富強欺凌中國，但對中國而言，「領土屬性」以及國事方面的近現代轉型，卻成為了一個追趕「先進」的西方的過程，藉此達到保護自己利權之目的（頁xxi）。

中國近代以來逐漸獲得的民族國家性格，即使在以國際主義為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統治下，仍無法淡化。早在1949年2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一行秘密訪問西柏坡，為即將奪取政權的中共謀劃未來的蘇中合作。當毛澤東問起如何看待內蒙古和外蒙古的聯合問題時，米高揚明確表示蘇聯「不支持」，因為「聯合會讓中國的領土大量喪失」。按照蘇聯人的意思，如果一定要聯合，則是內蒙古與外蒙古合而為一，成為「獨立的蒙古」離開中國。雖然該話題以「毛澤東大笑起來，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結束<sup>⑩</sup>，但「蒙古暗影」卻開始形成，並逐漸發酵。正如劉曉原指出的，「中蘇之間的蒙古問題，反映了民族利益衝突對當時社會主義國家間標榜的國際主義關係的顛覆傾向」（頁204）。

悖論二：「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是轉型為民族國家過程中

不可化解的一對內在矛盾。作者指出，「民族國家」範式的尷尬之處，就是世界上的「民族國家」多數是多民族共同體，極少是單一民族國家（頁xxiii）。中國面臨多民族的現狀，但其民族國家思想，按照王柯的說法，卻是「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為了能讓中國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中生存，1901年由梁啟超從日本引入「民族主義」。日本是一個自稱只有一個民族即「大和民族」的國家（其實不然），這就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從源頭上就接受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迷思<sup>⑪</sup>。這樣，近代「領土屬性」的轉型面對的挑戰是，如何維繫中央和邊疆的紐帶，使得中國既成為民族國家，又免於如奧斯曼帝國那樣在現代轉型後變得四分五裂（頁32）？

這種緊張體現在第二章關於辛亥革命後各方就「五族共和」展開的激烈爭論，最後維護統一終於凌駕於民族自決之上。其結果正如作者所揭示，「中國歷屆政府在『五域統合』方面成績斐然，而對『五族共和』所追求的多元族群政治結構，則顧左右而言他」（頁43）。中國歷屆政府在處理蒙古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的進退，都是在無法解決這個悖論的前提下為「五域統合」之目的而不得不如是的選擇。

悖論三：中國形塑民族國家的道路，始終無法忘懷於「天下」體系曾經的榮光，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時有宗藩關係的影子浮現。如第四章所示，二戰中國國民黨處理與朝鮮的關係時，蔣介石念念不忘孫中山關於「恢復韓、台，鞏固中華」的遺訓，試圖重新恢復中國對朝鮮地



緣政治的影響力。更典型的例子則是1940年代盛世才在中蘇之間選擇歸附蔣介石政權後，國民黨勢力進入了新疆，曾試圖重新恢復與坎巨提國的朝貢關係<sup>19</sup>。這些都是「以大字小」的宗藩關係的現代版，可謂「現代性中的傳統」(tradition in modernity)<sup>20</sup>。

## 五 餘論

今天邊疆地區的分離趨勢並未隨着中國的崛起而式微，相反，某些邊疆地區的分離活動似有愈演愈烈之勢，手段亦更趨極端。《邊疆中國》將這一困境概括為「中央政權的集權與一體化意圖與強調自身特殊性的邊疆分離主義之間的對抗」(頁298)。

困境首先來自悖論。既然「領土屬性」的轉型為外力植入，並非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所謂的「自生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sup>21</sup>，後雖成政府的主動追求，其方枘圓鑿至今仍在。無論是國人在西方優越感逼視下產生的「受害者心理」，還是「天朝」觀念不時迴光返照，都是中國在西方壓力下向民族國家制度演進所產生的後遺症。

但更關鍵的，還是民族國家理念所預設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排他性和「大一統」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中國並非單一民族國家，民國時期有所謂「五族」，1949年後識別出了五十六個民族。為維護「領土完整」，無論哪個政府上台總是把「一國」凌駕於「族群主權」之上。這一訴求在1949年後不僅使

「民族自決」難以實現，甚至因為國家對民族幹部的忠誠度缺乏信心，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只能是「少數民族當家，漢人作主」<sup>22</sup>。在宗藩制度下，漢民族和內陸邊疆民族雖時有衝突，「但大體上能夠在中華帝國的鬆散框架下共存」(頁287)。現代民族國家則極大加強了對內的控制，為增加凝聚力，努力將人口同質化，試圖抹去各民族的差異，這勢必引起邊疆民族的不滿。

這一困境更來自國家以黨權為根基的對邊疆的「熊抱」。西方的民族國家轉型是以民權取代王權，而中國的轉型則以民權口號始、以黨權實質終(頁xx)。中共建國後，曾一度讓邊疆民族問題有了改觀。研究涼山彝人的人類學家林耀華曾指出，1949年之後新政權之所以能成功「解放」涼山彝區，主要原因在於中共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以區分，成功地在彝漢被壓迫人民中找到了共同的階級利益——透過統一戰線，中共成功拉攏了少數民族中的上層人士；透過階級鬥爭，使少數民族的大部分人與漢族人口以階級為基礎團結了起來<sup>23</sup>。但文革後階級鬥爭不再「一抓就靈」，經濟主導的改革使得少數民族成為市場化改革的失敗者，卻在政治上缺少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於是民族區隔被逐漸強化，並成為解釋何以有些人成為贏家、有些人卻淪為失敗者的重要原因。

劉曉原認為美國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古代中國是一個「邊疆中國」的判斷今天仍然有效，這恐怕也是他以此為書名的原因之一。但在書中，他給「邊疆中

「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是轉型為民族國家過程中不可化解的一對內在矛盾。中國歷屆政府在處理蒙古、西藏、新疆問題上的進退，都是在無法解決這個悖論的前提下為「五域統合」之目的而不得不如是的选择。

劉曉原給「邊疆中國」賦予了新的含意，即「民族國家的框架成功地將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圈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但一個能將中國內地和民族邊疆的自發能動力導向同一方向共同倫理心態尚待形成」。他將今天中國的邊疆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邊疆」。

國」賦予了新的含意，即「民族國家的框架成功地將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圈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但一個能將中國內地和民族邊疆的自發能動力導向同一方向共同倫理心態尚待形成」。於是他將今天中國的邊疆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邊疆」（頁298）。

《邊疆中國》的研究視角是作者熟悉的外交史，即運用中英文外交檔案，從大國外交互動來考察邊疆。今天史學界已被新文化史所宰制，外交史研究逐漸式微，研究者正在摸索新的路徑，好盤活這百年老店。《邊疆中國》將外交史與邊疆史結合起來是一個好的嘗試，或可別開生面。作為外交史研究，本書主要的篇幅是在談現代中國疆域如何在大國關係的影響下形塑，對民族問題着墨不多。作為彌補，讀者或可同時閱讀王柯的研究，庶幾可以「邊疆」和「民族」兼得，有更全面的關照。劉曉原曾感慨美國有歷史學家特納（Frederick J. Turner）的邊疆理論，而中國學者至今還沒能提出有說服力的關於邊疆的理論。本書雖提到「邊疆意識對於現代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極為重要」（頁286），卻沒能做充分的發揮，以構建一個符合中國經驗的、讓人耳目一新的理論架構，令人稍感遺憾。

### 註釋

①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②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③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④ 「新清史」學派的研究，參見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nstitu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⑤ James Leibold,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How the Qing Frontier and Its Indigenous Becam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⑥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9-10.

⑦ S. 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⑧ C. A. Bayly et al., "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5 (2006): 1441-64; Alexander C. Diener and Joshua Hagen, *Bord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⑨ 參見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Eric Hyer, *The Pragmatic Drag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Boundary Settlement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5)。

⑩ 參見 Xiaoyuan Liu,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 War, Diplomacy, 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⑪ 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⑫ Charles S. 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no. 3 (2000): 807-31.

⑬ 齊錫生在《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1)

一書中指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中雖為盟友，但時有尖銳衝突，美國軍方對蔣介石政權的倨傲態度和蔣對此的激烈反應是導致盟友關係「劍拔弩張」的主因。

⑭ 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頁73。

⑮ 1970年代多家學術機構被政府組織起來書寫《沙俄侵華史》，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復旦大學、吉林師範大學等。

⑯ 吳文藻：〈邊政學發凡〉，《邊政公論》，1942年第1卷第5、6期，頁3-4。

⑰ 〈米高揚關於蘇中合作等問題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1949年2月4日)，引自沈志華編譯：《俄國解密檔案：新疆問題》(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頁295。

⑱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頁45-74。

⑲ 林孝庭：〈朝貢制度與歷史想像：兩百年來的中國與坎巨堤(1761-196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頁41-82。

⑳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㉑ Friedrich A. von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IL: Regnery, 1972).

㉒ 平措汪杰：《平等團結路漫漫：對我國民族關係的反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4)，頁5。

㉓ 林耀華：《在大學與田野間：林耀華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13-14。

毛昇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